警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灵鸡汤”化

韩 升

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对涵养我们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文化建设任务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项事关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构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当前，面对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特别警惕“心灵鸡汤”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稳定的思想体系和解释系统，在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过度解释”和“强制解释”，要接受和遵从一种最为基本的“客观性告诫”。“客观性告诫”要求我们直面言说对象本身，尊重言说对象的特定存在方式，力求避免主观任意对言说对象的过分干预。“事物与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对待而具有自身的存在，除非我们对此给予尊重，否则我们的谈论或阐释就根本不可能触到——一点都没有触到——事物本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灵鸡汤”化就违背了这种“客观性告诫”，背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指，陷入一种看起来颇为精致的任意和武断之中。这种解读和阐释鼓励、怂恿和放任了无拘束的主观随意性，无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澄明”。

这种“心灵鸡汤”化解读和阐释，放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基本意旨，完全按照自我主观的意图进行肆意的解读甚至曲解，在其背后是解读者和阐释者非反思的，流俗化、浅薄化的甚至是无头脑的任意和武断。从自我的兴趣、趣味、偏好出发，简单套用现代网络流行语言进行包装，迎合不加甄别、懒于反思的网络大众的猎奇求新的心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随意而不负责任的评点甚至戏说。这种解读和阐释实质上是一种“装饰性文化”，它的出现与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有一定关系，为博取眼球的各种无下限的“秀”均是以时尚的名义在剥离本应属于这个新时代的思想深刻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与沉淀，成为了涵养每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家国情怀、操守品格、理想抱负的最根本的思想资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我们能够品味先贤大哲们的高尚节操和人格魅力，由此反观自身的渺小与不足，并澎湃见贤思齐的激情和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代又一代典范的塑造和养成中激励着具体历史时空中的“现实之我”，将个体小我的命运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从而向“理想之我”不断迈进。被稀释为心灵鸡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难以承担这种成人成己的人格教化使命。心灵鸡汤所谓淡和顺应的佛系心态实际上带有强烈的犬儒色彩，并以之取代了豁达平和的君子心胸与豪迈气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被稀释为这种聊以自慰的心灵鸡汤，将使我们沉浸在自我构思的迷梦中难以自拔，清醒理性的现实认知将难以形成，也就无法认清国家、民族和社会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担当，高尚人格的塑造与养成将无从谈起。被稀释成心灵鸡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服膺于个体自我的狭隘格局，沉浸在日常小我的世俗与琐碎之中而沾沾自喜，失去了将个体价值实现于更为宏大高远的命运共同体之中的可能。那些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先贤大哲，在充满碎片化意味的“心灵鸡汤”式后现代叙事中沉降为市场逻辑的俘虏，不仅历史传统中的那些高尚人格遭到忽视，而且在边边角角的生活细枝末节的放大甚至曲解中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

“心灵鸡汤”式解读依托的是一种“盲目的先见”，这是一种应该去除的偏见，因为它来自对市场化逻辑和流俗化意见的屈从，实则带有很大的主观故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解读者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志趣呈现。当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说必然要立足于一种存在论意义的视角和立场之中，这是每一个言说者都无法摆脱的境遇。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将这种无法摆脱的历史给予称为“合法的先见”，而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接着讲”的基本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努力做到“接着讲”。这种“接着讲”并非文本的客观陈述（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照着讲”），也非“心灵鸡汤”式的肆意剪裁和任性渲染。“接着讲”意味着在传承中创新、在延续中突破，意味着文化命脉的绵绵不绝和自我更新，意味着一种文化认同的时代延续，意味着中华文化传统之成长性特质的不断呈现。在这样一层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能够避免言说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偏好，实现了言说者生存视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释系统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实现完美自洽。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言说者而言，要尊重中华文化经典的基本意旨，扎根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应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挑战，呈现最为本真纯然、最具时代特色、作为中华民族整个命运共同体生存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立足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扎根当今中国伟大的历史性实践，积极吸收人类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实质的青春气质和时代风采，促进中华民族更加稳健地走上深沉、厚重、坚实的文化自觉之路。对于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而言，捍卫我们的文化家园并由此维系文明教化之使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要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教化意旨，站在新时代的生存境遇之中进行积极的自我反思，担负起阐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使勤劳、勇敢、坚韧、奉献的中华优秀品格得到传承和发扬，引导社会普通民众突破狭隘可悲的原子化自我关注，放大人生的格局，提升人生的境界，自觉汇入蓬勃发展的大时代洪流之中，真正实现自我，书写无愧于这个伟大新时代的辉煌人生篇章。

让主旋律作品更加深入人心

黄钶涵

近年来，主旋律成了文艺创作界与评论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文学、艺术的主旋律作品纷至沓来，不断涌现。但是，客观地说，主旋律的文艺作品要想被广大观众赞美并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而留存下来，其实更需要下大功夫。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主旋律”作品。用优秀的品德和精神来陶冶人心、鼓动人们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和谐努力奋斗的作品，都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是抗战时期的主旋律作品，它们激励人们不怕牺牲，勇敢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朝阳沟》等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的主旋律作品，它们号召人们忘我地劳动，投身到祖国的建设热潮之中。对于这些作品，谁也不能否认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那么，问题不在于主旋律本身，而在于用主旋律的指导思想创作文艺作品的人。某些文艺工作者不是出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为了用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民族道德、核心价值观等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也不是为了展示光明的社会前景和树立民族的自信心，而是出于主旋律文艺创作在评奖上有政策倾斜、财政拨款较多、作品容易面世等因素的考虑，才致力于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创作。

因为动机不纯，其创作不是因为对生活有着深入了解而有感而发，而仅仅是为了表现主旋律而创作。他们不去深入和体验生活，不去了解社会，而是用心查寻未来几年里有哪些重要的纪念日，了解某一个地区从古到今出了什么样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人、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件，甚至千方百计打听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赞扬过什么人、评论过什么事。于是，他们在题材的选取上尽可能贴近这些重要的纪念日，为了争取地方政府尽可能多拨款，便用该地的名人为作品的主人公。但由于对所写的题材不熟悉，对所选用的一些素材没有深入的挖掘，自然地，所编写出来的故事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扁平化和概念化，其主题和同类作品相比，没有给人带来共鸣、启迪和更多的感动。这样的作品，当然得不到人们的称赞，更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某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构建这些作品的个人或团队却会得到不菲的稿费、表演费、导演费等等。

这种情况显然是对主旋律的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得很明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为了尽快尽早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主旋律文艺创作不但不能减弱，还要大力加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用了主旋律的概念，他说：“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那么，如何创作出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并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明了方向：“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主旋律作品创作，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精神，诚心诚意地为推动社会的发展、陶冶人们的情操、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服务。新时代的精神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当然不需要也做不到在一个作品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表现，可以用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来表现其内核。河南剧作家姚金成创作的豫剧《焦裕禄》就反映了新时代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科学实干、廉洁奉公的精神，就是这方面一个鲜活的例证。

二是要沉到社会生活中去，真正认识这个时代的工人、农民、士兵、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思所想，这样，才能写出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和塑造出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我们的创作者要把心放在如何让祖国繁荣富强上，放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放在人类的未来共同命运上，我们就一定能够写出深入人心的主旋律作品来，才不负这个既风云激荡又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观点摘编

● 中国影视文化面临着新的发展和机遇，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影视“走出去”必须加强影视传播力建设。影视传播力指涉的是影视在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对象等方面到达、覆盖范围和程度的能力。增强影视传播力，从理论视角来看，是提升影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从现实视角来看，也是打造影视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影视传播力经历了“宣传品”“作品”和“产品”三个发展时期，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整体上较为薄弱，存在着“看不懂”“讲不清”“达不到”和“吃不透”等突出问题。目前应从“全局性”“针对性”“接近性”和“有效性”四个方面入手，提升我国影视传播力。

（胡智锋、杨宾：《传播力：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古代文论遗产，“知人论世”观进入现代理论视野与跨文化的语境时遭遇了新的挑战。这一批评观提出了作者、文本与语境三要素及其内在一致性，当代汉学的研究实践体现出对此问题的开放性探究：“作者”概念本身具有多重范式指向，需从多元作者及其运作的维度来观察古典作者的观念、功能与效用；作者定位的困难与“文本”生成的复杂密切相关，应注重文本在共时与历时双重维度上的流变；相应地，“语境”不仅是多重与动态的，而且同样具有“文本性”，总是处在与文本阐释互为循环的重构中。通过释放“知人论世”观三项要素各自的复杂性，相对单一的传统方法裂解出丰富多维的探讨向度，为重访早期中国古典文献带来了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上的调整契机；同时，这一省思也映现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自身秩序的某些特征。

（郭西安：《作者、文本与语境：当代汉学对“知人论世”观的方法论省思》，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1期）

● 旅游地理学主要研究旅游地空间的结构与特征，而缺乏对旅游地空间营销的研究；旅游营销学主要研究旅游企业的产品营销，而忽略对旅游地整体空间的宏观营销研究。旅游地空间的整体性、整合性、系统性、公共性等特征决定了其营销模式的革命性，其基本模式的架构思路包括三个维度：谁营销、营销什么、向谁营销。旅游地空间营销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单一的利润回报，而是为了通过系统功能作用的发挥实现旅游地空间宜游、宜商、宜居、宜业的目标。旅游地空间营销通过信仰、规则、机制、策略和技术等方略实现。

（曾伏娥、时朋飞：《旅游地空间营销：一个理论模式的初步建构》，原载于《理论学刊》2018年第2期）

以小见大的《红军故事》

巴 图

戏曲演绎革命题材进而拓展其对时代的因应性，革命经典以戏曲叙事进而增强其表达的艺术性，这是传统戏曲实现“双创”的重要方向，是革命历史走近百姓的重要路径，国家京剧院京剧《红军故事》就体现了这种追求。

以小故事引发大创意。在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之际，本剧紧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主题，以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使命，以领袖点赞的红军经典故事为题材，以传统戏曲为表现载体，以国家院团艺术家为创作团队，既体现了戏曲艺术工作者的政治站位和文化自觉，也体现了剧目创作方向和题材选择方面的智慧与创意，可谓以小故事引发了大创意。

以小故事铺陈大史诗。西方研究者索尔兹伯里称，红军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奇迹题材，《红军故事》没有全景式再现长征的恢宏历程和场面，而是以独特的观察角度，撷取典型性历史截面的真实的人与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细致而饱满地挖掘红军精神，精巧艺术地呈现红军长征的革命史诗，可谓以小故事铺陈大史诗。

以小故事叙述大情怀。本剧由三个红色经典故事组成，透过不同年龄、性别、身份的红军指战员的生死选择，体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人格、百姓情结、干部气节，诠释出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高尚的思想情怀和温暖的人格力量，通过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革命道德精神，透视出了中国革命文化的真谛，揭示出人民军队的胜利秘诀，再现了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纯洁之源”的历史真相，艺术传达了红军革命道德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实现了赞崇高之信念、叹人情之真挚、立人物形象之鲜活的创作动机。从“半截皮带”“半床棉被”“一条红腰巾”为戏核儿，再现中国革命英雄史诗的情感力量、道德力量和信仰力量，可谓以小故事叙述大情怀。

以小故事创设大作品。三个相对独立的小戏组成一部大戏，近年少见，是戏曲艺术形态的创新呈现。从人物、主题、故事看，这三个小戏之间没有时间、空间、情节上的内在关联，但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设计，最终能三戏合一，拢聚在全戏整体格局调性之中，反而体现出艺术上的曲折起笔，宛转回向，沉着收束。此次国家京剧院以小戏创作来进行艺术突破，实际也为中国戏曲当前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取得艺术成功的视角方法，用适合的方法来驾驭适合的题材，才会有上乘的艺术效果和艺术作为。其实作为戏曲的本来形态，小戏更易自由发挥戏曲的本体特征，更易精细体现人性情感，更易灵活表现戏曲情节，这是戏曲发展历史中一条被反复验证的真理，却被长期忽略了。可以说，三部小戏因艺术加工而具备大戏的艺术品质，有其内在规定性，可谓小故事可以创设大作品。

以小故事彰显大规格。守格与破格的辩证法始终是戏曲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本剧以戏曲特殊的叙事方式，体现了简约大气的艺术写意之美，演员的表演严格运用戏曲程式并将其拍松不露痕迹的艺术地体现生活，这是戏曲现代戏表演应追求的等级，彰显了中华古典美学精神。在剧中，表演艺术家袁慧琴厚重大气、勇于探索的艺术风格对于年轻演员有很多帮助，剧中她饰演的徐解秀有50年时空的转换，导演设计现场将人物从80多岁老人转回到30多岁的乡村少妇，巧妙的设计赢得观众的喝彩。她与周婧、郭凡嘉、郭霄合作默契，一大段【反二黄慢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女战士和大嫂献被、抢被、剪被过程中巧妙设计的抢、夺、拦、剪等程式动作，让人感觉既生活又戏味儿十足。青年老生演员李博扮演老班长，在动静结合中见功夫，唱念做表张弛有度，剧中几段唱腔极尽韵味，开合自如，体现出较好的艺术表现力，是优秀青年正宗老生演员。扮演军需处长的青年文武老生演员杜喆巧妙运用探海、跪蹉、翻身、抢背等京剧传统程式，筋骨遒劲、骨气劲峭，他挥舞红腰巾，翻扑滚跌，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是难得的文武老生演员。总导演张曼君对于题材分析精到，成功把握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化原则，用简约的舞台风格衬托出不同主题和典型人物的内涵，在指导年轻演员塑造人物和化用程式方面很见功力。可以看出，主创者在自觉激活传统方面做足了功课。本剧首次在京剧舞台上运用两声部、女声四重唱的方式，把京剧老旦、程派青衣、尚派青衣、梅派青衣的行当和流派相融合，把旦角假声的二黄标准调和老旦的反二黄调门相结合，唱腔流畅，音色和谐，这样的创腔对于戏曲演员的演唱和乐队都是一个新的探索和考验。该剧的音乐大胆采用了湖南民歌的山歌作为背景，通过歌唱家吴碧霞在开场和结束部分两次清脆细腻的演唱，更加衬托出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除此之外，作曲家还通过进行曲和戏曲唱腔的结合创作出了红军女战士之歌，铿锵有力，催人奋进。

《红军故事》的创作说明一个真理，越是立足于深厚传统基础的戏曲艺术家，就越有可能在新时代戏曲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走在前面，越可能在艺术规格上食古而化，超迈入神，奔放驰骤，师古而不泥于古，可谓小故事可以彰显大规格。以小故事导引大取向。《红军故事》的成功给我们戏曲现代戏创作的一个重要启发是，革命信史是艺术实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蕴藏着无数生动的创作素材，无论何时都有直击灵魂的力量，我们只要秉持对伟大历史的敬仰，坚持真诚探索的艺术追求，就能在尘封的历史记忆中开掘出伟大的当代影响力。当然，对信史的艺术表达需要能力，需要主创人员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和艺术观，具备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言艺术家的高韵深情和坚质浩气，具备诚如张曼君导演所言的“不忘初心、方得大美”的艺术追求，更要具备新时代艺术工作者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价值取向。

艺海观潮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